

色頭史料薈要



包头史料荟要

第六辑目录

1	我和刘仁同志在包头的一段经历……	吉合忆述 李廷筋 张士耕整理
9	星星之火 ——中共绥远特委活动片断……	乔 玲
16	在调整中前进的包头医学院……	阎充英 朱企泰
39	前程似锦的稀土工业(下)……	吴克宇 祁国基
65	第一次解放包头亲历记……	企泰 文华
72	一九四八年冬包头第一次解放见闻录 ……	荣松亭口述 巴靖远执笔
80	冯玉祥将军在包头……	
91	云亨先生事略……	经革陈
96	包头商会沿革简记……	王富山口述 郭叔文记录
115	昔日的包头六成行……	武生荣
121	包头解放前夕见闻……	刘志强
127	我所知道的“九·一九”绥远起义 情况……	王孝模
129	包头历任县长见闻……	秦邦桢
134	日寇对包头的毒化政策……	石凤仪
141	郝孝周……	韩祥符
	《包头春秋》……	李绍钦
145	怀朔镇——北魏的眼睛	
154	六镇起义及怀朔集团	

164	阴山古刹——五当召·····	金 申
179	昔日的包头召·····	巴靖远
183	乌拉特后旗与昆都仑召·····	王龙耿
186	北魏时期包头地望考 ——对《魏书·地形志》朔州 条注的探讨·····	赵 予
194	乌拉山种种·····	宋硕甫
198	大板升城考·····	李漪云
210	包头市现状概述·····	杨瑞春
	《补充与订正》	
217	关于“复字号”的一点补充订正	
219	编辑说明	
	图片说明:	
	新建的包头医学院实验大楼(16) 1958年医 学院建校时的校址(18)附属医院手术队19 75年在固阳县新建公社做甲状腺针麻手术 (22) 77届学生在附属医院实习(28)八〇级 少数民族学生在一起学习(29)蒙古族副教授仁 钦在辅导进修教师(31)秦文斌教授和其他领导 欢迎日本学士院院士高滋夫教授访问医学院(36) 方毅副总理在“全国稀土会议”大会上讲话(40) 方毅副总理为稀土公司题词(41)稀土公司一厂 万吨铁合金车间一角(57)稀土公司三厂离子交 换分离制取高纯稀土(58) 1948年解放包头 时李井泉同志住所(68) 1948年第一次解放 包头后晋绥军区警卫连连部住所的大院门(69)怀 朔镇方位图(147)六镇起义示意图(163)大板升 城方位图(199)	

我和刘仁同志 在包头的一段经历

吉合忆述 张士耕 李廷舫 整理

一九三三年八、九月间，我正住在包头的蒙古族房东李二全家里，忽然有那么一天，乌兰夫同志和白海峰相跟着去找我，说是组织上派人来了，叫我快去会面。我听了这个消息十分激动。我在包头及土默川一带搞地下工作，又有好长时间和组织上失掉了联系，一直焦急地等待着组织上派人来，今天终于盼到了。

我们三人相跟着到了乌兰夫同志的一个亲戚家里，见到一个身材魁梧、精干洒脱的年青人。他操着带四川味的口音自报姓名叫王崇义，实际就是刘仁同志。他是随着去青海屯垦的孙殿英四十一军到包头的。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在包头建立绥远特委，刘仁同志来此任中共绥远特委书记，并宣布我任特委组织部长。身边又有了新的战友和领导人，心里说不出的喜悦。

刘仁同志是四川酉阳县人，在其舅父赵世炎影响下，十六岁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来绥远时只有二十四岁。他有着较丰富的革命阅历和斗争经验，工作

起来，是那样精力充沛，方法灵活，那样积极而又慎重。特委刚刚建立，一切工作都要部署、推动，而且要抓住四十一军暂时驻扎包头的时机，开展军运工作。任务那么繁重，条件又十分困难，刘仁同志事事身体力行，而且能很快打开局面。刚到包头时，他的工作重点是四十一军，军队里有党员、有支部，每个支部他都要去。四十一军有个随军的军官学校，驻在离包头百余里远的耙子补隆，他也亲自去跑。四十一军开到临河，他又从包头步行到临河，一面继续抓军运，一面了解地方情况，考虑如何在河套地区开展工作。那时他刚从天津出狱不久，因在狱中坚持绝食斗争，患有严重胃病，我怕他累坏，对他说：“你身体不好，又是特委书记，以后在家坐镇指挥好了，跑腿的事让我去干。”

他听后亲切地看着我说：“你是军人出身，体壮，腿长，肯定比我能跑。但我考虑你在这里呆的久了，认识你的人很多，便于了解情况，这是好的一面；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就是跑的多了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我刚来，还是让我先跑一跑，你在家当坐镇将军。”

开初特委就我们两个人。一般他出去跑的时候，我就得留在家里。他总是将危险的事安排给自己去做，把安全让给别人，使我很受感动和教育。我又给他提建议说：

“要不咱们谁也不要跑了，叫下面来人汇报，有事布置一下就行啦。”

他摇摇头说：“那怎么行！我新到一个地方，跑一跑，是为了悉熟情况，向大家学习。”

确实，刘仁同志来包头不久，就掌握了许多情况，熟

悉了好些人。他通过李森等同志的关系，也常到“老一团”去。“老一团”是一支由蒙古族组成的部队，由于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统治，也由于我党的地下工作，这支部队虽然领国民党的军饷，但对国民党反动派没有好感，而对一些蒙、汉族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倒常常给与同情和保护。刘仁同志在那里交了好多朋友。后来他要去北京汇报工作，“老一团”给他开护照，不光省下了路费，而且还一路畅行无阻。

刘仁同志不仅善于深入群众，而且善于同各种各样的上层人物打交道，搞统战工作。四十一军有个参谋长，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刘仁同志和他交朋友，向他宣传革命思想，这个参谋长认为刘仁同志是个有热血、有作为的年轻人，在某种程度上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同情和支持。当时包头还有个冀鲁豫同乡会，会长姓李，是个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的人，按照刘仁同志的意见，我们和他建立了关系，并把那里作为一个联络点。

二

由于刘仁同志的到来，包头地区党的工作很快出现了一个较为活跃的新局面。

后来四十一军离绥远到了宁夏，特委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工运和农运方面。一九三三年前，刘仁同志曾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领导工人运动，有这方面的经验。在包头，他首先深入到铁路工人中去，和工人交朋友，了解工人的劳动、工资和生活情况，给工人讲资本家和工人的雇用和被雇用、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启发他们

的觉悟，教育他们认识工人阶级的利益，团结起来，同剥削者作斗争。在工人中建立党支部以后，他通过党支部，在工人中发现和培养骨干分子，教给他们用罢工的方法，迫使铁路当局给工人增加工资。他们采取的罢工的具体作法是：工人们既不喊口号，也不示威，当货车进站后，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不说，就是不卸车，或者是不装车。这样，影响了货物运输，铁路上就要赔款，所以，当局只好和工人讲条件。工人只有一条要求，就是增加工资；铁路当局火烧眉毛，只好被迫答应。斗争的表现形势象是自发的，背后却有党在发动和领导。这种斗争看起来很平常，其实却很扎实。斗争的胜利，工人们不仅得到了经济利益，而且看到了团结斗争的力量，增强了信心，下次就更好发动，而且斗争起来也更有力量了。那时包头车站发生的两次较大型的罢工，都是刘仁同志参与发动和领导的。

在农运方面，我们除了直接深入到土默川蒙汉杂居地区开展工作外，还负责领导着临河县委。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上半年，临河县委由老霍、老侯二同志负责。一九三四年春天，刘仁同志又派王逸伦同志到河套去，继老霍同志任县委书记。王逸伦同志在河套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群众同村长算帐，抗捐抗税，搞得也很有声色。

三

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中共绥远特委改为绥远省委，由中央驻北方代表直接领导，刘仁同志任省委书记，我任组织部长，于岳山（即梁一鸣）同志任宣传部长。这中间，上级还派了鲁奔、安建平等同志来绥远工作。我们都一起

住在包头。这年年底，由于北京党的组织遭受破坏，我们和上级组织又失掉了联系。刘仁同志十分焦急，和我商量，准备到北京去找组织。我说：“你不能去，组织遭受大的破坏，肯定有叛徒，叛徒的头上又没刻着字，你去了该找谁联系？”他凝目沉思片刻，表情严峻地对我说：“和组织失掉联系后，我们身上的担子更重，工作也更艰苦了！”

果然，白色恐怖很快来到绥远，来到包头。在包头铁路上工作的老李同志被捕了，鲁奔、安建平等同志都被迫离开了包头，我和刘仁同志面临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有一天我们正商量怎么办，李森同志跑来，叫我们搬到包头附近沙尔沁村恒生同志（蒙族，解放后曾任内蒙驻京办事处主任）家去住。我和刘仁同志当时心里火热，真不知怎样称赞和感激李森同志。

我和刘仁同志在绥远做地下工作时，一直得到李森同志兄弟般的帮助和爱护。李森表面上看是个粗人，不讲究穿着，说话也很随便，但他干起工作来却十分严肃认真。平时他总是留心地把各样事情、各种情况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不声不响地想办法去做，而且对什么事情都考虑安排得十分周到细密，表现出他不仅忠实于党的事业和同志，而且是个有心计的人。我和刘仁同志在包头的几个住处都是他妥善安排的。四十一军驻包头时，曾在四十一军中作过地下工作的刘汉军同志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眼看就有被捕危险。刘仁同志找李森同志商量，让他想办法给刘汉军找个地方隐蔽一下，李森同志很痛快地答应下来。没过几天，他就给联系好了，而且借了钱买好了一匹马，把刘汉军同志送到了“老一团”的黑马队。这次又是

这样，我们谁也没有对他讲，他主动考虑到我们的安全，为我们找好了新的住处，而且来通知我们搬家了。

我们知道，凡是李森同志为我们找的住处，都是很可靠的。房东恒生同志是个忠厚老实的蒙古人，我们住在他家，交往一天比一天深，什么事情也不回避他，有些事还让他帮着做。譬如请他把文件翻译成蒙文，帮助滴蒙文刻印等。他不是党员，但对我们的身份十分清楚；我们对他也很相信。当时由于左的思想支配，觉得他家是地主，又是前任土默特总管的亲戚，没有发展他入党。恒生同志也有自知之明，不声不响，只是默默地和我们配合，给我们以保护和支援。

在白色恐怖下，刘仁同志仍想方设法开展工作。当时西公旗（现乌拉特前旗）王公贵族内部闹纠纷，他知道后便派人插进去作工作，想把一个王爷拉过来。为了这事，他还在我和恒生同志的陪同下，亲自去了一趟西公旗。

那是一九三五年初春，塞外荒原上正刮着尖利刺骨的寒风，我们三人骑着马向西公旗出发。为了掩护我们的身份，我留着黑胡子，拿着旱烟袋，装成行医看病的先生。路上碰见有人问：“先生多大年纪啦？”我用手指头一抹胡子，故意老声老气地说：“不大，四十八。”其实我才二十九岁。行路上装成个邋遢老汉，不大引人注意，再加上有恒生这个当地蒙古人同行，把刘仁同志夹在其中，便很顺利地到达，又很顺利地回来了。

四

从西公旗回包头后，不知不觉，卷着沙尘的西北风变

得柔和些了，树渐渐泛绿了，路旁的小草也快冒芽了。但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却仍然象严冬一样，笼罩着绥西大地。

有一天，我和刘仁同志从沙尔沁进包头城里了解情况，天黑时我先到以前的蒙古族房东王九旺家里，接着又到李二全家里。大约十点多钟的时候，我和刘仁同志正在灯下谈话，有个女人推门进来，神色慌张地对我们说：“二位先生，我家掌柜请你们这就过去。”

我认出她是住在同院的蒙古族妇女，李森同志的婶婶。心想，这么晚叫我们去干啥呢？我和刘仁同志到了她家，没等我们开口，李森同志的叔叔就从炕上坐起来对我们说：“叫二位不为别的，今夜十二点警察要来抓你们，现在快十一点啦，你们赶快躲一躲！”

我们听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不禁感到惊诧。李森的叔叔又说：“不要紧，要是躲不及，你们就藏在我房里，我和他们拚了，也不能叫他们把你俩抓走！”

刹那间我和刘仁同志激动地看着李森同志的叔叔，心中纵有千言万语，也不知该说哪一句。我们当即转身出门，约好了碰头地点，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向着黑沉沉的夜幕里走去。后来得知，我们走后不长时间，国民党警察果然到李二全和王九旺家搜捕。李森同志的叔叔曾在“老一团”当过排长，至于他是怎样得到的消息，我们却没机会再问清楚了。

五

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一九三五年四、五月间，临河地

下党组织也遭受破坏，有的农民党员被捕被杀，敌人下令通缉县委负责人王逸伦等同志。在我们长时间和上级失掉联系的情况下，经我和刘仁同志商议，决定到共产国际去，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和请示工作，并领取活动经费。后来王逸伦同志到了包头，他也同意去。可是我们三个人当时几乎是分文没有，要去共产国际，路费怎么办呢？经过商量，刘仁同志让我到归绥（呼和浩特）去一趟。我到归绥找到奎壁同志，奎壁同志又将我们的打算告诉了乌兰夫同志。乌兰夫同志热情地邀我到他家去，和我一起吃了顿莜面，留我住在家里，我俩进行了一次几乎是彻夜的长谈。第二天我便离开归绥，十分满意地回到了包头的沙尔沁村。

这已是一九三五年夏天。几天后，我和刘仁、王逸伦、恒生同志一起从包头到归绥时，奎壁同志已为我们备好了三峰骆驼，一头驴，同时买了白面、生烟、哈德门香烟等货物，乌兰夫同志也为我们拿了路费。于是我和刘仁、王逸伦同志扮成商人，恒生同志担任翻译，陈四拉骆驼，一行五人，依依不舍地向土默川告别，离归绥翻大青山，向着西北方向出发了……。

以上讲的，已是四十六年以前的事情了。但是，当年刘仁同志和内蒙古蒙、汉族同志团结战斗的感人情景，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当年，我们同那里蒙、汉族同志在共同斗争中所建立起来的深情厚谊，对我来说是永志不忘的。

星 星 之 火

——中共绥远特委活动片断

乔 玲

五十年前，我们的党还在幼年时期。但是，在黑暗中国的大地上，到处点燃起革命的“星星之火”，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奉党中央的指示，来到地处祖国北部边疆的包头。不久前，我们访问了曾在包头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几位老同志。他们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曾涌泉、军事科学院顾问吉合、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梁一鸣。当时地下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刘仁同志，因遭林彪“四人帮”的摧残迫害，已于一九七三年十月惨死狱中。在接待我们的访问时，几位健在的革命前辈思今抚昔，忆述了青年时代在包头斗争的生活。

下面记述的就是三十年代中共绥远特委在包头活动的片断。

绥远特委建立前后

一九三二年春，曾涌泉同志来包头与王若飞同志接头，因若飞被捕，没接上头。不久，通过地下党员李森

（蒙族、现为内蒙古民委副主任）见到了刚从银川来包的西北特委军事部长吉合同志。在没有接到上级新的具体指示前，曾涌泉同志暂住在美岱召地下党员三德胜（蒙族）的岳父家里。为了开展工作，曾涌泉同志化装成商人，吉合同志化装为医生，以行商治病作掩护，到后山地区农民中开展工作，熟悉农村情况。后来返回包头，住在久长成巷的一个大院里，工作也随即转向国民党部队，打算通过地下党员及同情革命的各种社会关系，为建立党的武装力量作准备。联络对象一个是国民党的某机枪连，一个是“绥远老一团”。“老一团”是绥远省地方骑兵部队，里面不少下级军官和士兵是土默特旗穷苦的蒙古族人，他们同情革命，早就和我党有联系，曾、吉等同志就利用这个有利条件进行宣传、组织工作。“老一团”后来掩护了不少革命同志，为保存党的实力作出了不小贡献。

一九三三年春，曾涌泉同志离包向上级汇报包头工作，后因另有任务没有回来。

当年九月、十月间，奉上级指示，刘仁同志和梁一鸣同志到包头，建立地下党的组织——绥远省特委。特委机关设在东河区东门大街十二号院内租用的民房。特委书记由刘仁同志担任，化名王崇义，负责全面工作，工作重点是抓国民党孙殿英部四十一军，策动部队起义，为革命组织武装力量；吉合同志担任组织部长，化名张德胜，负责农运工作，重点是蒙古族聚居的农村；梁一鸣同志担任宣传部长，化名于岳山，公开身份是设在包头召内的土默特小学教员，重点负责铁路工运工作。一九三四年，组织上又派来夫妇两人，男的姓鲁，化名小王，主要负责青年团工

作，也到石拐煤矿做工运工作；女的姓安，住机关，负责日常工作。平常，特委的同志们分散活动，每月在东门大街十二号院开一次秘密会，研究工作，交流情况。一九三四年四、五月间，接到上级指示：将中共绥远省特委改称为绥远省委，直接由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当时的中央代表驻天津，负责人是孔原同志。

党中央十分关怀绥蒙地区的革命斗争，在三十年代初就发出了《中共中央在内蒙古工作计划大纲的指示》，指出内蒙古民族革命对中国革命具有的重大意义，民族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彻底完成。提出“蒙汉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在党中央文件的指引下，同志们进行了艰苦的工作，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包头车站“特别支部”

三十年代，包头的工业还十分落后，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只有火车站。特委书记刘仁同志遵照党中央“工人群众是党的工作对象”的指示，亲自深入到铁路工人中进行组织工作，不久建立了包头车站党支部。第一个发展的党员，是包头铁路抚轮学校青年工友陈平正同志。当发展到三名党员时，正式建立了“包头车站特别党支部”。陈平正担任支部书记，每周和梁一鸣同志接头一次。后来，党员发展到五、六名。通过党员秘密宣传组织，不久，就建立起党的外围组织“赤色工会”。为了避开敌人的怀疑，特委决定调出陈平正同志，并重申了工作纪律：党支部对任何人绝对不能公开，工作要十分稳妥严密，团结群众，孤立敌人。经过一段工作，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先后组织

了两次公开斗争。一次是在搬运工人中搞的。搬运工苦重，工资低，生活十分穷苦。党支部组织工人罢工，当火车开到正道上准备卸车时，工人们拒绝卸车。当时车站只有两股道轨，列车站了道，堵塞线路，铁路当局急了，要工人派代表谈判。经过谈判，工人取得了胜利。经过这场斗争，工人懂得了团结就是力量，斗争才有活路。

另一次是抗议车站开除三名工人。这件事，经特委研究指出：斗争策略要有理有利有节，方法要灵活。车站支部根据特委指示，具体研究方法，派人找铁路当局谈判，提出：“为什么要开除三名工人？如果开除这三名工人，我们要全体罢工。”铁路当局惧怕引起工人更大的动乱，只好让步，答应不开除，只给记过。又经过说理斗争，迫使铁路当局连记过也撤消了。

夺 水 斗 争

负责农运工作的吉合同志，经常深入农村，吃住在农牧民家里，和农牧民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张胡子”。为了在农牧民中顺利开展工作，他刻苦学习蒙语，能讲一口流利的蒙古话。他说：那时在农村牧区活动，常常遇到“执法队”的盯梢和搜查，每当敌人到蒙古老乡家里寻问有无外人时，不论大人小孩都说“莫特乖”（汉语不知道），支走敌人，然后掩护我们安全转移。他经常向牧民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推翻王公贵族，争取人类解放”的道理，使革命的“种子”在群众中生根发芽。由于他们的积极工作，先后在土默特一带

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壮大了革命队伍，建立了五、六个活动点。有萨县水洞沟门、萨县西北沟卡子、毕克齐火车站南的一个民团、东莎尔沁水沟和将军窑子南边的捏尔苏等。

一九三四年水洞沟门发生的分水浇地斗争，就是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那年正逢干旱，地主不让农民浇水，眼看着干旱的庄稼浇不上水，贫苦的农民心急如火。在特委的领导下，由当地活动点的一位姓兰的同志，组织了附近的二十多位农民，开展了夺水斗争。他们先派代表向地主交涉，要求给农民合理分水。地主一看势头不妙，只好假意答应农民可以在夜间浇水；可是到了夜晚，狡猾的地主又暗地派狗腿子堵水。农民发现以后，便派人看门看水，按顺序浇地。地主心狠，继续采取各种办法堵水，不让农民浇地。群众斗争情绪高昂，组织起来把住进水口，不让地主浇地。这一来，地主着了慌，到县里去告状；农民也组织起来赶到县衙门打官司，弄得县长也没有办法。结果还是地主托人请客、讲和，答应让农民浇水方才罢休。这场斗争，从始至终都是在特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由于古合同志出谋划策，分析形势，研究办法，采取对策，团结群众，终于取得了胜利，达到了“打击地主，团结群众”的目的。

特委还以包头为据点，把工作扩展到后套地区，在临河县农村领导农民革命，发展了党员，建立了临河地下党的县委。刘仁同志还亲自到五原检查工作。

瓦解敌人营垒

遵照党中央组织革命兵变的指示，特委领导以刘仁同志为主，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工作。经过艰苦的秘密宣传和组织，终于在国民党孙殿英第四十一军内争取到一部分官兵准备起义。就在这时，国民党的“执法队”在查店中，搜查出了特委暗藏在“泰安客栈”内的起义联络旗号。秘密暴露了，形势逼迫，特委决定提前起义。结果，因准备仓促，未能成功。但是，武装起义必竟震撼了敌人营垒，扩大了革命影响，而我们也从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

在向国民党军队进行工作的同时，特委还注意了民族工作。工作重点 is 揭露民族上层分子投靠国民党、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活动。为了加强各民族被压迫阶级的联合，一九三四年三月份，特委研究由梁一鸣同志用“内蒙古人民自治同盟”的名义起叫了《告蒙古人民书》，阐明了我党的民族政策。这个文件经中央代表批准，翻译成蒙文，正准备印制散发时，适逢转移，这个材料的原稿及密写件，连同印刷用的油印机都埋到了山里了。

安全转移

一九三五年七月间，绥远特委与上级的关系突然中断。在这一特殊情况下，特委的同志们沉着冷静，特委机关首先转移，有的住在农村，有的住在“绥远老一团”内，暂时隐蔽。“老一团”有个排长名叫王久旺，思想进步，同情革命，特委同志们就经常在他家秘密开会。一天，刘仁、吉合同志正在王久旺家里商讨工作，突然闯进